

文明的守望

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

国家图书馆——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BASTIONS
OF
CIVILIZATION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文明的
守望

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

国家图书馆——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BASTIONS
OF
CIVILIZATION
a History and Exploration
of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 / 国家图书馆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5
ISBN 7-5013-3139-1

I.文... II.国... III.古籍—图书保护—研究—中国
IV.G25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3804 号

书名 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
著者 国家图书馆 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8
印张 30.25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13-3139-1/G · 660
定价 195.00 元



◎封面图片为宋施元之、顾禧编注《注东坡先生诗》残卷，宋嘉泰淮东仓司刻本。此书先后为著名藏书家毛晋、徐乾学、宋荦、翁方纲等递藏。清光绪间，湖南湘潭袁伯夔以三千金购得，视若拱璧。后袁家不慎起火，袁于大火中将此书救出，十九卷残帙民国间为中央图书馆购得，现藏台北。2004年，国家图书馆购得陈清华海外珍藏，其中幸见该书第四十二卷，上面尚有被火烬痕。

编纂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周和平
副 主 任 李 雄 张 旭 詹福瑞
委 员 刘小琴 张雅芳 陈 力 张玉辉
李致忠 张小平

名誉主编 任继愈
主 编 詹福瑞
常务编委 张志清 陈红彦 林世田 李际宁
冀亚平 鲍国强 杜伟生 全桂花
周崇润 张 平 程有庆 赵 前
孙学雷 郭又陵 徐 蜀 孙 彦
编 委 贾双喜 唱春莲 金 靖 史 睿
薛文辉 白鸿叶 李 坚 李文洁
萨仁高娃 黄 霞 孙 俊
汪桂海 李国庆 姜 猛 唐桂艳
杜云虹 黄显功 陈先行 徐忆农
童正伦 寻 霖 林子雄 陈晓玉
彭邦明 易雪梅 罗 琳 刘 蕾
编 务 张木森 陈 为 刘玉芬 王文蓓
董 蕊

摄 影 赵建中 乌心怡

鸣 谢 首都博物馆 湖南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四川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致 辞

在世界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对全世界文明发展曾经有过积极、重要的影响,这影响至今仍存,充分表明了中华文化的伟大生命力。

中华民族祖先创造并不断完善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大大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典籍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承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珍贵的古代典籍,迭经历史上的政治动荡、兵燹水火之厄,迄今遗存下来的,可以用吉光片羽、百不存一来形容。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典籍损坏自不必说,仅仅人为因素,如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政治因素,就造成了大量重要典籍的散亡。往哲先贤为中华民族文脉的延续,以生命的代价使典籍得以流传,或留下实物,或留下记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们保护古籍的理念和实践,至今仍为我们所借鉴。

在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即投入资金修复《赵城金藏》,让文物工作者至今津津乐道。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的文献如百川归海,纳入公藏机构,形成以公藏为主的新格局。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政府对古籍保存保护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强。库房的建立和改造、缩微胶片的拍摄和使用、珍贵典籍的复制和推广、文献的修复和保护研究,逐渐融入了更多的科学内容,见到了喜人的成效。

2002年5月,财政部、文化部联合发文,成立中华再造善本规划指导委员

会和编纂出版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政府斥巨资进行的再造善本工程，既是对善本古籍的积极保护，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项目开展以来，藏书单位同心协力、共襄盛举。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目前已经完成印制图书500余种，选录丰富，印装精美，得到领导、学者的一致好评。在编纂出版的过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同一部书分藏几地的，此次得成完璧，即便未成完璧，也已经最大程度合龙，几部相同版本残本配补成为完帙或接近完帙，都极大方便了读者，服务于学界；一些原来必须阅览原书的，已经开始以再造的善本替代，原书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日益酸化破损的古籍；一方面是严重匮乏的修复队伍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的科研环境。古代典籍的原生性保护呼唤政府加大力度，贯彻落实。

2005年，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进入筹备启动阶段。这个计划拟用十年时间对全国古籍进行普查，培养一批保护修复专业人才，抢救修复一批破损严重的珍贵文献，改善图书馆的保护环境，提高古籍保护基础试验和检测能力，从而使我国的古籍保护事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在全国古籍保护专家和图书馆界的共同努力下，2005年制订了关于古籍定级、破损定级、书库环境、修复技术、普查和人员培养等6个标准，完善了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方案。加大投入，保护古籍，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

老子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限的物质资源之所以能造福人类，要依赖无形的文化来支撑。我们回顾历史，审视今天，展望未来，希望更多大众通过了解古籍特藏——这一兼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重性质的人类文化遗存，升发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同时也对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倾注更多的关注，共同为典籍传诸永久，付出一致的努力。

文化部副部长 周和平

2006年5月

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中国是善于运用典籍记述自己历史的国度，典籍宏富，浩如烟海。

古籍不仅是记载知识的书籍，更是一种文物。由于其载体的特殊性质，注定它的生命更加脆弱，更易被侵害。古籍上记载的各种书厄，触目惊心。兵火丧乱，霉烂蠹蚀，豪夺计赚，种种恶劫，致使古籍传至今日，百不一存。

为了保护古籍，传承中华文明，2002年5月，财政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印发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文社图发[2002]21号），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利用现代出版印刷技术，使珍善孤本化身千百，传承文化，合理利用，繁荣学术。目前工程的第一期制作及提要撰写工作已完成大半，再造的善本已经走进高等院校的校园，摆上学者的书案，成为收藏家的新宠。在图书馆，她已经替代原件接待读者阅览使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使收藏和使用的矛盾得到了比较好的缓解。作为国家图书馆，既可以用再造善本为读者提供珍稀文献服务，又可以使善本原件得到更好的保护。国家财政真正起到了为文化遗产保驾护航、繁荣文化事业的作用，这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也是国家加大文化投入，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举措。

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古籍原生性保护也日益得到政府的重视。作为一种文物，古籍迫切需要普查和定级，否则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书籍承载了人类太多的思想、智慧、历史和创造。但纸制文献的特点，注定了它与其他文物相比更易损害。古籍加速酸化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保护古籍，时不我待。

为介绍中华古籍的文化与知识，唤起全民的古籍保护意识，本馆在“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开幕之时特别编辑两部书：《文明的守望——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巡礼》突出展示财政部、文化部开展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重大成就；《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则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古代典籍的丰富多彩，欣赏到古代典籍的写绘、雕刻、印刷、装帧之美。通过一书一册、一纸一图，让读者体会到从古到今的人们保护古籍、减少各种伤害、延长古籍寿命的心智。

读者在这两部书里还可以了解到珍贵古籍特藏品保护修复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古籍的法规制度，将大批古籍集中调拨国家图书馆，统一保存，致本馆古籍数量急剧扩大，形成今日收藏宏富的局面。为保护这些古籍，本馆在日常修复古籍、提供读者使用以外，还特别组织力量抢救修复了《赵城金藏》，并借此培训了一批专业修复技术人员，使本馆修复工作始终处在全国的前列。以后又陆续开展了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馆藏拓片修复等专项保护工程。我们还希望读者通过了解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典范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和古籍原生性保护的事业——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使古籍保护与修复事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詹福瑞

2006年5月

中华古籍特藏保护展览随想

北京大学教授 荣新江

造纸和印刷，这两个现代书籍所必备的技术，都是由中国人首先发明的，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这两项技术虽然可以找出许多技术方面的原因或渊源，其实在我看来，纸的发明，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商周以来发达的“书写”需求；而印刷术的发明，则和中国古代官府和文人对书籍的“收藏”和“阅读”的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且不论从商周的甲骨到秦汉的简帛，只就留存下来的六朝唐宋的敦煌写本和宋元明的刻本古书来说，其数量恐怕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无疑是我们能够在世界人民面前感到骄傲的地方，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题材。

然而，与西方的大理石铭文和羊皮书相比，中国的纸确实容易破损甚至毁坏，历史上有大量抄写和印制书籍的记载，也有许多“书厄”，如大业漂没、靖康之耻、绛云烈焰等，大量图书的损毁，使许多珍贵典籍不复存在。

书籍也是古今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唐代僧人玄奘赴西天取经，带回来数千卷印度梵本佛经，它们或许至今还封存在西安大雁塔中；而日本遣唐使船以及唐宋以降的商船，把大量的中国古籍运往日本，其中许多珍本还保存在奈良的正

仓院和一些寺庙当中。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掠，大量珍贵的图籍，如皇家收藏的《永乐大典》，被火烬捆载而去，其他以各种手段巧取豪夺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敦煌宝藏的流失是中国书籍迁转流散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900年，由于偶然的机会有，住在敦煌莫高窟前下寺的王道士，在其居所对面的洞窟墙壁上发现一个复洞，里面收藏着数万件写本典籍、经卷、文书和数千件绘画美术品，它们应当是公元11世纪初封存起来的三界寺的藏书和供养具，写本年代从5世纪初到11世纪初，应当是西晋年间发现汲冢古书后面世的最为重要的典籍了，而且其中不仅有汉文文献，还有丝绸之路上各种民族文字的典籍和文书，所以它们既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宝藏，又是东西方文明交流极其珍贵的记录。

可惜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宝藏，从1900年发现，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前来觅宝之前的七年时间里，虽然王道士曾将其中的经卷和绘画送给过许多清朝的官员，却没有一个官员想去仔细追问它们的来源。直到法国人伯希和继斯坦因之后获取了藏经洞的宝藏之后，在1909年把一些精品出示给北京的学者，这才震动了罗振玉等人。罗振玉等报告学部，由学部电令甘督派人把剩余的经卷悉数调到北京，可是负责其事的人并不认真，让王道士窝藏了一些，沿路还有遗失。这批上万件的敦煌写经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敦煌书库，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的“劫余”之物，但其中仍有不少宝贵的资料，比如本次展览所陈列的摩尼教残经，就是摩尼教的根本经典之一，成为今人研究摩尼教的基本依据。

由于清朝地方官员的无能和当时中国学者没有意识到应该亲自去敦煌调查，造成敦煌宝藏的大量流失，大批写本入藏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处，而美术品则入藏英国国家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俄罗斯爱米塔什博物馆等处。根据对敦煌藏经洞的宝藏原状的研究，我认为这些写本和绘画原本是属于三界寺的图书馆，它们原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可是现在经过王道士的私自馈赠，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巧取豪夺，马车在崎岖山路上的颠簸运输，使得敦煌宝藏现在已经四分五裂，许多原本完整的写本被撕成断片，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国家。即使在伦敦，原来在藏经洞中是一个经帙包着若干卷佛经，而现在却按照西方“科学”分类方式，经帙因为有丝织花纹而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写经作为图书而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这使得我想把经帙合一，从而复原藏经洞书籍原样的努力几乎无法实现。

其实，对于敦煌学的研究者来说，写本的缀合可以给枯燥的研究带来无尽的乐趣。1991年，我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编纂敦煌写本残片目录时，曾把十几件《列子》残片比定出来，并缀合成三大片，判定它们都是属于同一个抄本。回国后，我询问国家图书馆所藏未刊残片是否有《列子》，得到肯定的回答，我猜想一定也是出自同一个抄本。捡出来一看，果然不错。如果这类写本都收藏在一个地方，那不知要省去研究者多少宝贵的时间。所以我更加希望原本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文献，将来能够尽可能地归总到一起，这不仅利于研究，也有利于保护。我们可以将那些原本是同一个卷子的不同残片裱合起来，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工作可以进行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拥有多少更加完整的敦煌文献！

书籍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书籍的收藏和保护其实就是对自身文化的爱护。书籍的流散从物质层面来讲，是国家和民族珍宝的流失；而从文化层面上来讲，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敦煌宝藏的流散的确是中国文化的浩劫，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敦煌文献和绘画也促进了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我当然希望敦煌文献像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所藏的《永乐大典》一样，早日回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透彻的研究，来整合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化遗产。

过去，我曾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访查流散在国外的中国典籍，其过程既有不少心酸的经历，也有许多收获的乐趣。近年来，我也经常利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和金石拓本，知道国图在中国古籍的收藏、修复、整理、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国图还依托本土优势，与学术界密切合作，以举办讲座和学术会议等方式，利用馆中聚合的中国最佳典籍资源，促进学术交流，推进学术研究。从一个学者的眼光来看，国家图书馆对于中国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做了实实在在的好事，对传承中国文化实在是功德无量。

2006年4月20日

关于敦煌遗书的保管与修复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方广锬

敦煌遗书与甲骨文、汉简、故宫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它具有极高的文物、文献与文字研究价值。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以敦煌遗书为代表的敦煌文物进行系统研究，开创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陈寅恪先生曾经著文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而敦煌学就是“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产生以来，在中国中古史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宗教、历史、文学、语言、文字、音韵、社会、法律、医药、音乐、美术、舞蹈、以及民族史、边疆史乃至书法、绘画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众多成就。它对中国中古史研究推动之大，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敦煌学能够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首先，敦煌是古代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敦煌在古代世界的这一地理位置，使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以及以古希腊文化为起源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化，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古代世界六大宗教在这里汇合，这决定了敦煌遗书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也决定了敦煌学的



世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与敦煌遗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敦煌列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这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特性。敦煌遗书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势必相应地要求其研究也必须是世界性的。正是在各国、各学科的学者相互交流、共同努力下,敦煌学才逐渐发展,不断成长并推向前进。

其次,由于历史原因,敦煌遗书现散藏在世界各地。本文不想对那不堪回首的敦煌遗书流散过程进行叙述与评价,只想指出,敦煌遗书散藏世界的现状,也是敦煌学在20世纪成长为世界性学问的重要因素。

上述两个因素,前一个是内在的,由于敦煌遗书蕴含的研究信息是世界性的,无论敦煌遗书流散与否,决定了敦煌学必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后一个则是偶然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它在百年敦煌学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同时我们应该指出,由于敦煌遗书流散在世界各地,对敦煌学进一步深入发展造成种种障碍。

敦煌遗书是一批稀世珍宝,很多人对它在世界各国的保管及修复情况很关心,这里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略作介绍。

从保管的角度来讲,我所考察的各国情况互有不同,总的来说都比较好。1991年我初次访英时,英国的敦煌遗书存放在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恒温恒湿的书库内,绝大部分备有特制的专用藏柜。每号遗书均有特定的架位,不挤不靠,整齐码放。这些遗书对所有的读者都开放。其后英国国家图书馆修建了新馆,敦煌遗书迁移到新馆特设的专用书库中,存放条件进一步改善。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虽然没有特藏专库,但敦煌遗书均放在特制的纸盒中,按照遗书大小不

同，有的一盒一号，有的一盒数号。不论盒内藏数多少，每号遗书均有专门藏位，整整齐齐，也对读者开放。我所考察过的俄藏敦煌遗书大多一一存放在特制的纸筒中。虽然没有机会参观俄国的书库，但看到过照片。照片上书库中摆放着一排排书柜，纸筒罗列在书柜中。日本各收藏机构的敦煌遗书保管得也都很好，但一般查阅起来手续比较麻烦。有些机构不甚愿意让人看；有些机构索费甚高；有些至今秘不示人。当然，也有不少机构热情接待，有求必应，甚至倾囊出示的。印度新德里博物馆收藏的敦煌艺术品较多，遗书数量有限。我所看到的敦煌遗书都展平夹在玻璃板中陈列。

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原收藏在文津街七号北京图书馆旧址。1936年，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不断升级，为防止这批珍宝被日本帝国主义劫夺或受到战争的破坏，北图特意将敦煌遗书转移到上海，秘藏在某外国银行，直到全国解放才运回。紫竹院公园旁的国图新馆建成以后，敦煌遗书全部移存新馆。库房按照“三防”要求设计，恒温恒湿，条件很好。只是遗书数量很多，而存放敦煌遗书的特藏库空间狭窄，原来用以存放敦煌遗书的箱子也不够用，只好放在各种铁柜、木箱乃至自制的纸盒中。近年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在国家图书馆的努力下，为全部敦煌遗书量身定制专用木盒与书柜。较大的写卷，一卷一盒，放在书柜的特定架位上，彻底改变了前此几十号敦煌遗书同放一个抽屉、相互挤压的情况。此外，国图还在善本库房中特辟宽敞的敦煌遗书特藏库，使敦煌遗书的保管环境也大为改观。可以说，现在国图敦煌遗书的收藏条件已经今非昔比。环顾世界，这样的条件也是一流的。国图的敦煌遗书也向所有的研究者开放。

由于敦煌遗书为古代佛教寺院弃藏，大部分残破不全，这就产生一个修复问题。世界敦煌遗书的修复，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为代表，其中英国最为典型，即近百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采用各种方法致力于敦煌遗书的保护与修复。

从敦煌遗书入藏开始，英国国家图书馆（当时属大英博物馆）就十分重视对这批稀世之珍的保护，对一些残破较甚的经卷，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当时的图书保护专家在比较了各种方法以后，认为用丝网加固最为合适，一批敦煌遗书便采用这种方式来加固。有些是单面加固，有些是双面加固。这种方法虽然使残破经卷得到护持，但丝网的遮蔽还是会对文字的识别造成阻碍，这在照相图版上反映得较为明显。尤其有些墨迹较淡的字，本需要在阳光下侧视识别，但此时会因丝网反光而干扰识别。随着时间的流逝，丝网加固的弊病日益显露。主要是丝网老化变硬，使得一些卷子很难舒展，且边角容易损坏。我还看到这样一个卷子，系双面加固，由于背面有一处文字，加固者为避免丝网遮蔽文字，特意在文字处的丝网上挖留一孔。这样处理，在当时确是好意，但现在，文字处背面丝网与纸张分离，最终造成文字部分脱落，不知去向。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缩微胶卷上还能看到这处文字，而在原卷上则是一个空洞。或许因为这些原因，英国国家图书馆后来废弃了丝网加固法，遇到残破经卷便干脆将它粘贴在一张硬纸上；如果该卷子两面都有字，便用半透明的纸予以裱糊。对一些较短小的经卷，则粘接护首、拖尾，或十号为一个单元，整个粘贴在一个长卷上。这样做，写卷是被保护了，但造成写卷形态的改变（厚度）及